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报告

内部文件，供学习参
考，請勿外传。未經本
人審閱，請勿引用。

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翻印

1961年12月20日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报告

今天我把“实践論”、“矛盾論”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綜合講一下。大家学习时提出一些問題，我又不好按照問題一个一个解答，那样太零碎了，所以我想着重把这三个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一些說明，附帶解答一些大家提出的問題。可能有些問題解答不到，教員同志可以輔導，我就不解答了。有些問題比較重要，复杂的解釋一下，要每個問題都解答，時間也困难。

今天把这几个文件合起来講，大体上分四部分：一、“实践論”和“矛盾論”写作的历史背景和它們的意义；二、“实践論”的主要内容；三、“矛盾論”的主要内容；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内容。

一、“实践論”、“矛盾論”写作的历史背景及这两个文件的重要意义。

我們学习馬克思主义著作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当时为什么要写这著作，写出来有什么意义、作用。这是学习馬克思主义理論方法上必須要注意的，因为馬列主义理論都是理論联系实际的，不是脱离時間空間的，不是脱离具体問題的。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都是有的放矢。毛主席所講的

E161/43 08

都是有的放矢，都是在一定時間、一定空間、一定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某些实际问题才写的。尽管他講的理論有普遍性，可以运用在很長的時間內，但是产生这理論总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学毛主席的著作也要注意这一点。“毛选”四卷是按照革命历史的发展来編的，編的方法体现了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把“毛选”編成哲学部分、政治經济学部分、軍事部分，而是按照毛主席写作的历史順序編下来，这样就便于我們了解毛主席的每篇文章是在什么地方写的，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理論問題来解决当时的問題。“毛选”的編法也是和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一致的。

“实践論”、“矛盾論”是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里的，而这两篇文章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經驗的总结。我們学习这两篇文章当然一定要联系当前的問題，但是要了解这两篇文章的精神，总还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为什么要这样写，所以先把历史背景講一講。

这两篇文章是1937年写的，这时候正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結束，抗日战争刚开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經形成。这文章就是毛主席在延安講課时的講稿。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当时有这个必要。我們党当时已經成立十六年了，經過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战争中我們党有很大的发展，革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錯誤也犯得很多，可以說，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在犯錯誤，十六年里，有过兩次右傾机会主义，三次“左”傾机会主义，革命遭到很大損失。1935年遵义會議才开始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領導，在毛主席領導下，全党走上正确的道路，基本上沒有犯什么錯誤，但是中間也还有

張國燾路線——右傾機會主義有三次，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羅章龍右傾機會主義、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張國燾的一次是部分的，不是整個黨的領導，整個黨的領導基本上還是毛主席。但是我們要看到一個情況，就是1935年以後，雖然毛主席的領導樹立起來了，但是是否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很好樹立起來？恐怕還不能這樣講。1935年遵義會議主要解決了軍事問題，政治問題擺在一邊。遵義會議僅僅對軍事問題作了結論，在軍事上樹立了毛主席的思想領導。黨的正確領導的樹立是1935年開始，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從政治上、思想上把黨的正確領導全面地樹立起來，這一點在1935年是作不到的。因為遵義會議是在長征途中召開的，時間很短，軍事問題迫在眉睫，需要馬上解決，而來不及解決政治問題、思想問題，也不可能解決，因為思想問題、政治問題是更複雜、更深刻的問題。當時在政治上沒有批判“左”傾路線，軍事上批判了。所以，需要一個時期逐漸把毛主席的理論在全黨全面地樹立起來，就是說，需要解決黨的各方面的思想問題，要使所有的黨員幹部在立場、觀點、方法上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然後才能從政治上弄清楚問題。“實踐論”、“矛盾論”可以說是為了在黨的領導方面、特別是在政治上樹立起正確的路線作思想準備。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樹立毛主席的領導需要思想準備。為了要作思想準備，要在政治上樹立正確的領導，就需要對全黨的政治經驗、歷史經驗作一個全面的總結。不在幹部中把十幾年的革命經驗作一個充分的總結，黨員幹部的政治思想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要把歷史經驗總結的很清楚，而且大家都對總結都有認識

了，然后才有可能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致。如果不把經驗好好地总结一下，当时提出毛主席思想，是不是能夠为所有的干部接受？不一定。因为对历史經驗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总结的話，毛主席思想就不一定能夠为每个人所認識。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在1935、1937年提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在党的建立时就开始提出了，至少“毛选”第一篇文章就提出了他的正确的政治主張，提出了明确的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綫。对于右傾机会主义路綫、“左”傾机会主义路綫，毛主席每一次都站在正确的路綫上加以反对。但是，为什么在1935年以前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没有佔統治地位？問題是干部没有历史經驗。在經驗沒有总结的时候，干部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一定很好。究竟誰对誰不对，一般干部搞不清楚。因此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出来，但是并没有能夠在广大的干部中得到正确的認識。每一次領導犯錯誤就批判，換領導，又犯錯誤，又批判，再換領導。而且，每一次領導犯錯誤都有人跟着跑，不仅領導人犯錯誤，而且要影响到黨員、干部。所以，在十六年中間，毛主席的思想虽然正确，虽然不断提出反对錯誤傾向，但是沒有为广大干部接受，成为党的領導思想。所以，這個問題不是偶然出現的。几个領導人有錯誤思想，不仅仅是个人的問題，虽然領導人犯錯誤个人也有問題，但如果仅仅是个人問題，錯誤路綫就不一定成为領導的思想，它是全党的思想問題。所以，要使全党干部能夠全体一致接受正确路綫，在党内充分树立毛主席的思想指导，首先就需要干部有能力辨别是非，至少大多数的干部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要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錯

誤的。有了这个能力，然后历史經驗才能得到正确的总结，才能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正确的路綫，什么是錯誤的路綫。因此，需要一个思想准备，要設法使党員干部能夠在立場、观点、方法上端正起来。所謂辨别是非的能力，就是立場、观点、方法的問題，看問題的能力問題。1935年遵义會議时，如果除了軍事以外，把政治問題提出来，那时候不一定能夠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那时候解决軍事問題是可能的，因为失敗摆在面前，全党干部都已經有經驗了。但是，对于政治路綫也是錯誤的，这問題不一定能夠得到很多干部的了解，所以在这时候要解决这个問題是不可能的。全党干部在政治上全面解決問題是經過1941—1945年的整风运动，直到七大才作出決議，七大算是充分解决了党的政治領導的問題。开七大好不容易，七大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到延安学习好几年，毛主席在1941年作了“改造我們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才作“整頓党的作风”的报告，这就是整风的开始。从1942年—1945年經過四年時間教育干部，然后才能夠在路綫問題上、政治上使全党得到充分正确的了解。我們党的历史說明，一个党要充分树立正确的領導是很不容易的，除了要有成功、失敗的各种經驗而外，还要在思想上作很好的准备，正确的路綫才能在全党干部思想中真正地树立。我們現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設，也經過这样一些困难，大家都沒有經驗，因此在这問題上辨别是非的能力就有問題，所以这几年我們就出了一些偏差。总路綫：三面紅旗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作的时候出了很大的偏差。三年来中央并不是沒有提出正确的意見，毛主席不断地提出正确的意見，

从郑州会议开始，毛主席把现在我们整顿的任务、提高工作的基本原则都提了。郑州会议是在河南开的，直接听得最多的是河南的领导同志，但是河南工作的毛病就特别大，毛主席当面提出了，但是他没有接受。什么价值法则、反浮夸风、按劳分配、平均主义等问题都提了。但是毛主席提出了，下面还是顾虑重重，仍然还是搞自己的一套。所以，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树立不是很容易的事，要作很多的思想准备。遵义会议以后，为了使全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充分掌握正确的路线，要对全党首先进行教育，为了进行这样的教育，毛主席在1937年开始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倡唯物辩证法，亲自讲课，因为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矛盾论”、“实践论”可以说是在哲学上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遵义会议是在军事上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遵义会议也还没有完全总结，比较完全的解决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是从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来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从政治上全面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就是七大的决议。没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不可能有七大；如果七大以前毛主席不作这许多准备工作，不作“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那就不可能产生七大这样好的决议。“实践论”、“矛盾论”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过程中很重要的阶段的标志。它们的作用就是这样。

这两篇文章不仅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而且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发展。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為著作翻一翻，很系統地講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著作還沒有。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寫得很多，系統地講了一下唯物主義的問題。但是里面所解決的問題還沒有“實踐論”的多。“實踐論”的字數很少，但是它系統地解決了認識規律的問題。“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就是解決了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問題，堅決反對了唯心主義的精神第一性，物質第二性的觀點，明確地提出了唯物論的根本原則，肯定了客觀第一、主觀第二，肯定了人的思想應當反映客觀，正確的思想是正確的反映，錯誤的思想是錯誤的反映。這篇文章雖然寫的這樣多，但是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列寧為什麼要寫這麼多？因為那時的一些唯心主義在用很複雜的方法把唯物論的道理歪曲了，宣傳了一些唯心主義的道理，寫得非常巧妙，使人很難搞清楚它的錯誤，所以列寧要用很多的字、很多的話把它批駁過來。“實踐論”的字數雖然少，但是解決問題比“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更多一些，它解決了認識過程中一系列的問題，它不僅告訴我們正確的認識應該是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這一點列寧用了幾十萬字來證明，“實踐論”用不着再證明了，所以就用一兩句話交代了——而且進一步解決了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反映客觀世界的問題。列寧的著作里沒有處理這問題，“實踐論”解決了，說到認識的過程、認識的規律性，比較系統地加以說明。還有一個方法的問題，怎樣用辯證法分析問題，以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里只是肯定了辯證法的正確性，對於怎樣用辯證法解決問題，以前沒有系統地闡述，“矛盾論”解決了這問題。這些地方說明，“實踐論”、“矛盾論”不僅解

決了中國的問題，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同時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所發展。

關於發展的問題作一點解釋。“矛盾論”講到蘇聯有一個德波林學派。德波林是蘇聯的哲學家，他的哲學在1928、1929年時候在蘇聯很流行，它之所以能夠在蘇聯有很大的影響，主要是這樣的原因，就是蘇聯在1928年時，要搞五年計劃、合作化運動，受到右傾機會主義的抵抗，這就是布哈林。布哈林以前在蘇聯也是很有地位的，曾經有很有名的理論著作“唯物史觀”，當時全世界都認為這本書是最好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但是，布哈林的書實際上並不是正確的，它的理論是機械唯物論。布哈林在政治上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反對消滅富農，反對合作化運動。1928年要搞集體化，就要批判布哈林，在政治上批判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那時是斯大林領導的，斯大林是有功的，堅持列寧的合作化道路，反對布哈林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當時如果沒有這個鬥爭，蘇聯的集體化就搞不起來，列寧的路線就不能堅持，所以，斯大林的功勞是很大的。在反對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時候，德波林在哲學上就參加了批判布哈林的機械唯物主義，所以他那時的哲學地位就比較高。那時老哲學家是這樣，青年哲學家沒有出來，他比較老，因此他的地位很高，寫了很多的文章。但是，布哈林有錯誤，德波林批判了布哈林，德波林自己又另外犯了錯誤。德波林的哲學是教條主義，理論脫離實際，他雖然在哲學上反對了布哈林，但是他自己的哲學著作並不正確接觸社會主義革命、合作化、集體化的問題，他所有的著作，幾乎沒有一篇文章涉及到社會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据尤金大使講，他知道德波林有一篇文章談到集体化問題，只有千把百字，他的著作有一、二百万字，但談到合作化、集体化的問題只有千把百字的地位，所以他的哲学脱离实际的程度很厉害，他写的文章总是引証書本，講辯証法总是講黑格尔的辯証法，不強調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辯証法。还有一点，德波林是普列哈諾夫的学生，是信仰普列哈諾夫的，因此他写的文章都是宣傳普列哈諾夫的哲学著作，不宣傳列宁的哲学著作；在他所写的文章里，总是有这样的口气，好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里，只有普列哈諾夫是真正研究哲学的，列宁是搞实际問題的，好象列宁对哲学没有什么重要的貢獻。宣傳普列哈諾夫，貶低列宁，这就是德波林派在政治上的一个特点，他的哲学本身是理論脱离实际的。所以，1928、1929年一个时期有这样的影响，后来他的毛病被发现了，社会主义建設起来以后，一检查理論战綫上的情况，发现他脱离实际，因此就进行批判。这批判开始是德波林的学生搞起来的，尤金大使是主力軍，他当时是德波林的学生，开始批判德波林的教条主义。后来斯大林注意了這個問題，亲自领导，并且肯定德波林学派并不是一般的教条主义，是孟什維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孟什維克的性質，这种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致，理論脱离实际，嘴上、文章上講唯物辯証法，但是行动上不是唯物辯証法。德波林学派在苏联一个时候很有影响。毛主席就講到，我們中国的“左”傾冒險主义和德波林派不是沒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这并不是說王明、博古直接当了德波林的学生，他們在苏联留学，受了那种空气

的影响。我們中国“左”傾冒險主义那一批人中也有个別人搞过德波林哲学的。以前在我們党校当教員的一个張如心同志，就是在当时苏联留学回来的，写了一本哲学書，里面完全把德波林的一套搬来了，1931年在中国出版的。王明、博古这些人不一定搞他的哲学，但是从思想本質、思想方法上看，是这样一种性質，只研究理論，輕視实践經驗。在苏联，德波林使理論界脱离社会主义建設；王明、博古这些人拿到中国来，把馬克思主义理論脱离中国的实际，他們至少受了那种空气的影响。刘少奇同志曾經写过一篇文章，反对孟什維克傾向，里面講孟什維克就是言行不一致，嘴上講馬克思主义，思想上对馬克思主义实践是輕視的。在苏联是批判德波林派，在中国毛主席批判三次“左”傾机会主义，批判中国的德波林派。所以，这一点說明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国际上哲学发展的过程是密切結合的，不是孤立的，它不是单独在中国发生的。馬克思主义发展到当时，哲学发展到当时，和苏联的哲学有联系，也可以說毛主席这篇文章繼承了当时斗争的成果，因为毛主席写这篇文章时是引用了苏联当时的那些著作，引用了批判德波林的著作。当时苏联有一些很好的，革命性很強的文章，強調理論联系实际，強調哲学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共产党的总路綫服务，強調列宁在哲学上的貢獻。在那些文章里差不多把列宁著作里最好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因此毛主席就通过那些書，利用那些書，充分地掌握了列宁的哲学思想。所以，这两篇文章里引用了列宁的很多話，直接繼承了列宁哲学的成果，而且加以发展。这一点我們也要注意，說明他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发

展，不是簡單的解決思想問題的著作，也不是中國孤立的著作。這兩篇文章的直接鬥爭對象主要是當時的“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但是也批判了經驗主義。總的來說，它們在哲學上總結歷史經驗，為了正確總結歷史經驗，需要批判錯誤的路線，而主要是批判教條主義，所以特別提出德波林的問題。

二、關於“實踐論”的主要內容

“實踐論”的內容主要是講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這篇文章里很有系統地解釋了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說明了認識的規律。這在以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里是沒有的。辯證法的核心是矛盾論的規律，唯物論的核心是認識論，所以，“實踐論”、“矛盾論”可以說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著作，抓住了辯證唯物主義最根本的東西。“實踐論”如果學好了，那麼對唯物論就基本了解了；“矛盾論”如果學好了，那麼對辯證法也就基本了解了。

“實踐論”的內容大體上包括三方面：一、認識不能脫離實踐；二、認識的過程是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三、認識是在實踐的基礎上永無止境地發展着的。

（一）認識不能脫離實踐

“實踐論”的第一句話就指明我們這裡所講的第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以前任何唯物論不同的地方，就是肯定、堅持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不能離開實踐來考慮人的認識問題。認識是在實踐中發展的，是從實踐來的，一點也不能脫離實踐，正確的認識是主觀正確

反映客观，这种反映是在实践中来的。这个道理一般没有什么人反对，好象不难了解，但是要在实际工作中真正作起来、真正贯彻这个原则也不很容易。在理论上几千年的哲学家都没有解决，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才开始解决，以前的哲学家从来都不知道这一点。这个问题很不简单，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了，虽然是常识，但是在行动中不一定能够真正充分贯彻。比如这几年以来的瞎指挥风，如果你把他摆到课堂里，告诉他认识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可能他不反对，可是他在指挥工作时又搞瞎指挥风。这是为什么？他就是闭着眼睛指挥，不看实践、不看经验，想到什么就搞什么，就是认识离开了实践。农村里有一些青年干部，也不管以前的农业经验怎样，也不管老农的经验怎样，自己想到什么就随便乱搞。工厂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轻视老工人的经验，乱指挥一顿。这些例子说明，在实际工作中要贯彻认识与实践密切联系的原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前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问题就更明显了，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也是一种瞎指挥，根本不管过去的经验。毛主席已经创造了一套很好的经验，如十六字诀等，红军本来也是打得很好的，但是王明、博古这些人一来，带上个李德，李德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搬到革命战争的队伍里，要想打阵地战，孤军深入。你说他的脑子里有没有认识？有认识。他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有书本知识，可是这些认识和中国当时的实践不相符合，就是认识脱离实践，所以就犯了那样的错误，甚至搞全国总暴动，也不管中国是什么国家，后来又搞什么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想很快地转到

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上更大的勝指揮。“實踐論”里有一句話談這問題，是有所指的，當時主要的批判鋒芒是針對“左”傾機會主義。文章沒有直接講革命經驗，當時也不宜於直接把革命經驗講出來，但是提出了唯物論的原則，就是堅持主觀要反映客觀。但是怎樣反映？第一個原則就是要使認識和實踐密切聯系，不要使認識脫離實踐，聯系應該是密切聯系，而且是經常聯系，不能夠聯系一下又脫離了。任何一種知識都是從實踐來的，所以錯誤的認識曾經也是正確的，因為它是從實踐來的。三次“左”傾機會主義在政治上有这样的錯誤，就是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都是反動的，不知道他有兩面性。這個思想從哪里來的？是從蘇聯搬來的，是從列寧書上搬來的。列寧在“兩個策略”里講的是俄國的民主革命，俄國民主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就是沒有兩面性，而是反動的，所以兩個策略里講到資產階級時僅僅是談孤立它、打擊它。這個思想是否正確？在俄國當時是正確的，這個思想和俄國當時的實踐是聯系的。可是，王明、博古這些人把它硬搬到中國來，這就和中國的實踐脫離。所以，任何正確的思想，即使原來是正確的，但是如果運用時和當時的實踐不符合，那就錯了。書本的意見是正確的，如果不結合實踐，就錯誤了。經驗也是这样，個人的經驗，如果不能和當時的實踐聯系，就容易犯錯誤。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有一點離開都不行。我們現在對這個道理比較容易了解。原則是要聯系行動的，要經常尊重實踐。領導要尊重實踐，領導決定原則時要首先尊重實踐。教條主義、當時的“左”傾機

会主义和毛主席思想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是否尊重实践的問題。三次“左”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根本不尊重实践，他尊重書本。尊重書本也并不是完全錯誤的，我們是要讀書的，讀書上有价值的东西，輕視書本当然是不对的。馬列主义的書應該重視。但是，應該排队，究竟实践應該排在第一位，还是書本應該排在第一位？書本知識也是正确的，應該尊重，实践也應該尊重，哪一方面應該首先尊重？應該首先尊重实践，但也不能輕視書本。全面的看法應該是这样。如果認為尊重实践是第一位，因此認為書本就可以不注意了，那当然也是不对的；但是，強調書本知識的正确性，忘記了首先應該尊重实践，这一点錯誤更大。領導思想的出发点應該是实践，不應該从書本本身出发。

对領導指示負責和对实践、羣众負責要一致（对羣众負責就是对实践負責），哪一方面为主？應該是辯証地看：实践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我們認識的基础，領導思想是作为指导。我們的农业、工业問題也是这样，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指导。首先應該重視农业，但是也不輕視工业，因为工业有指导作用。所謂指导，就是指明它的发展方向，有指导作用，就是推动它发展。工业发展了，农业才能前进，农业过关要靠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要靠工业发展，所以，工业对国民經济有指导作用，有推动作用。但是，沒有农业就沒有工业，所以农业是基础。領導指示和羣众經驗的关系怎么摆？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指导。兩者都重要，但是出发点、来源是实践。任何一种領導思想，只要是正确的思想，总是从实践来的。我們在貫徹上級指示时，也要注意

到上級的指示是從實踐來的，也是以實踐為基礎。所以，上級有了指示，我們來運用時，也要注意從自己的工作實踐出發，不能離開實踐。“左”傾冒險主義就是運用列寧書本的指示，脫離中國的實踐，所以就犯了錯誤。在具体工作中，上級的指示一定要貫徹。但是在貫徹時一定要從實際工作出發，一定要從自己的工作實踐出發，從周圍羣眾的要求出發。要貫徹上級的指示，尊重上級的指導。但是如果貫徹得好，一定要結合具体實踐，要根據具体情况來提出具体辦法貫徹，而不是機械地貫徹。如果上級指示和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我們有这样的原則，就是可以向上級提出意見、靈活執行。有時上級錯了，錯了也要貫徹，因為是組織原則。貫徹下去會發生毛病，要想法使毛病尽可能減少，同時要向上級提意見，要把羣眾的意見作為基礎，來領會、貫徹上級的指示。沒有領導指示，工作是搞不起來的，所以指示總是起指導作用的。所謂指導，就是指導一個方向。瞎指揮風有一個矛盾，就是總想把指導原則帶動具体工作，那是錯的。指導原則就是方向，具体工作要根據具体實踐具体安排。不尊重具体實踐，在指導思想里想把一切具体問題都解決，那就一定要發生瞎指揮風。所以，作為上級發指示，總是要越原則越好，黨領導工作要通过行政，不能代替行政，黨討論問題，決定大政方針，作的時候由行政部門具体貫徹，這樣就比較好，指導思想就和實踐密切結合。如果黨的領導去代替行政處理一切具体問題，那麼也就不象黨的領導了。黨的指導思想是從羣眾中概括出來的，找出一些原則的東西，而它的基礎是實踐。所以，任何時候認識一定要和實踐很好地

結合。

這是“實踐論”的第一個問題，寫“實踐論”時毛主席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者不尊重實踐、輕視實踐。

（二）由實踐到認識的過程是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辯證的認識過程。實踐是基礎，是認識的來源，指導思想是從實踐來的，實踐是我們的出發點，有實踐才能產生認識。能不能說：實踐就是理論，就是認識？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要尊重實踐，因此實踐就代替一切。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是認識的出發點，但是不能說實踐就是認識，更不能說實踐就是理論，實踐不能代替理論。有這種觀點的人是什麼思想？這種思想就是經驗主義。如果說教條主義使認識脫離實踐，那麼經驗主義就是認為實踐等於認識，可以代替認識。有了這樣的思想就會犯錯誤，就是輕視理論，認為有實踐、有經驗就夠了。

毛主席的文章里主要批評了教條主義，但是也批評了經驗主義。因為以前三次“左”傾冒險主義領導時，主要的錯誤是教條主義。但是經驗主義也幫了教條主義的忙，因此，“實踐論”也批評了經驗主義。“實踐論”里没有把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的名字直接提出（戴上帽子是後來的事“整頓黨的作風”里談到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但是它講的思想是批評了這兩方面的錯誤。經驗主義為什麼會幫助教條主義？有經驗主義的人有兩種危險，一種就是認為經驗是一切，實踐就是一切，因此就有這樣的問題，把局部的經驗當作普遍的真理，因此輕視理論。反對教條主義以後，這種傾向已經發生，有人有這樣的想法：書本理論知識不是完全對